

中国乡村建设

ZHONGGUO XIANGCUN JIANSHE



秋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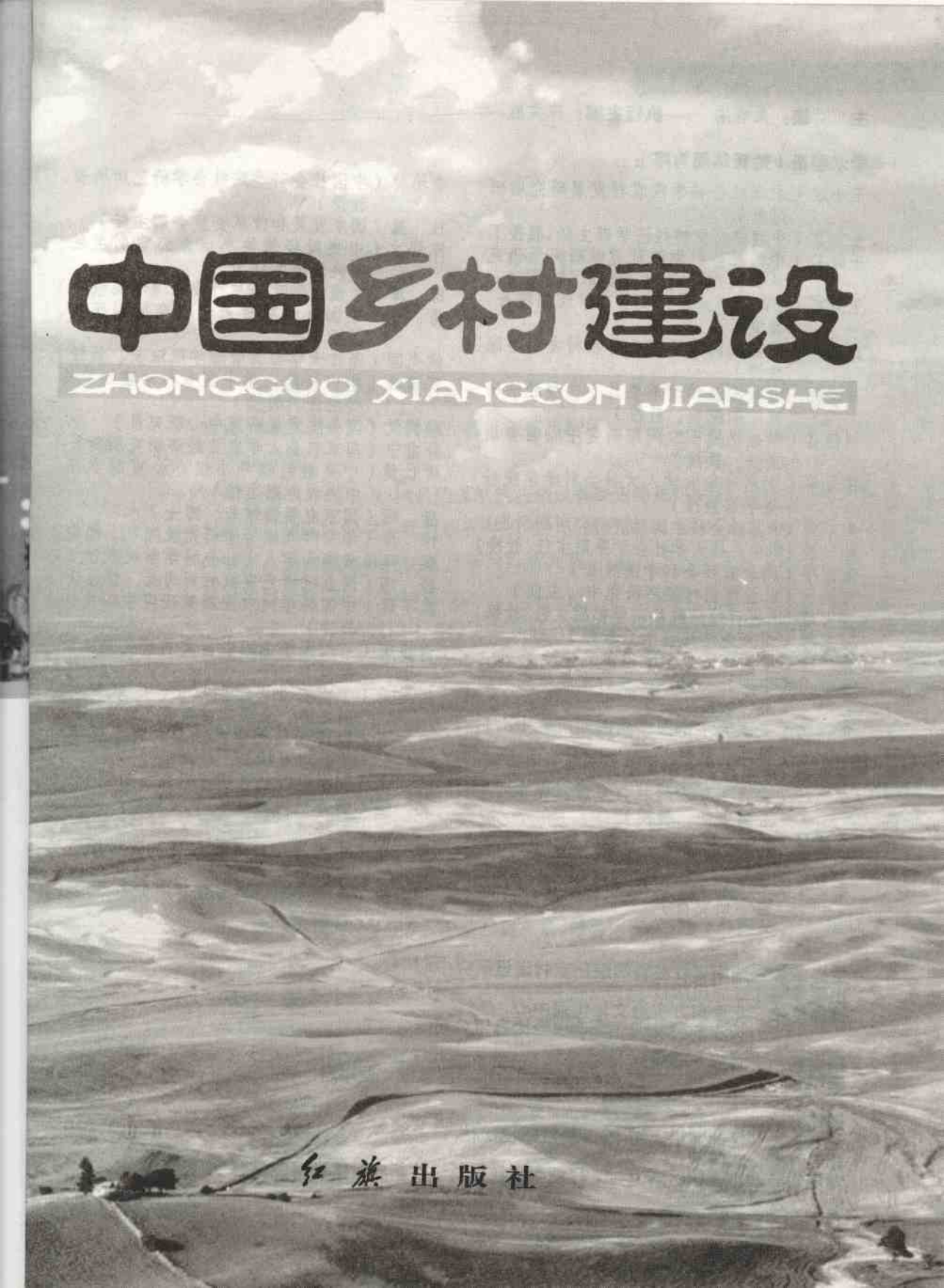
主编：朱有志

执行主编：陈文胜

- 从信访制度看社会稳定机制
- 日新月异看大寨
- 生活垃圾正在严重污染乡村生态环境
- 一个乡干部的耕地承包工作手记
- 广东农产品物流遭遇现代化难题
- 新典型村庄调研报告
- 一个新的农民自治组织是怎样建成的
- 泰国农民市场体验和观察



红旗出版社



中国乡村建设

ZHONGGUO XIANGCUN JIANSHE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乡村建设. 秋之号 / 朱有志, 陈文胜主编.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51-1825-6

I. 中… II. ①朱…②陈… III. 乡村建设—研究—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502 号

书 名: 中国乡村建设 秋之号

主 编: 朱有志 陈文胜

责任编辑: 栗博莉

特约编辑: 韩志利

责任校对: 刘文芳

装帧设计: 东方资治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 编: 100727

E - 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64068163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30mm × 960mm 1/16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825-6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主 编：朱有志 执行主编：陈文胜

学术委员（姓氏笔画为序）：

- 王小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东京（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马晓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德喜（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孙立平（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朱 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 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
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德元（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李小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李远行（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李建华（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杜 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
陈 潭（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房 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唐仁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
唐 珂（国家农展馆馆长、博士）
徐 勇（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秦 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郭 玮（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司长、博士）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温思美（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蒋建农（红旗出版社社长、研究员）
韩 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潘 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办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出版单位：红旗出版社

协办单位：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
长沙乡村发现三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副主编：王文强 陆福兴

编辑部：刘亚平（特邀） 刘新荣 刘祖华 王慧敏 蔡琳琳

通讯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甲 83 号红旗出版社

邮 编：100727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浏河村 7 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邮 编：410003

投稿邮箱：zhgxcfx@163.com

网 址：http://www.zhgxcfx.com

| 卷 | 首 | 语 |

受“征服与控制自然”的欲望所支配，人类在农业社会中，为解决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的矛盾，过度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进入工业社会后，追逐远远超过正常需求的享受更加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样的消费导向导致资源被竭泽而渔式采掘，能源大量消耗，农业生产化学化，人类在享受眼下物质极大丰富、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的威胁。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生动的笔触，详细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该书一面世立即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并引发了各国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事业由此展开。

中国的环保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于改革开放后，从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召开，到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到科学发展观和当前的“两型社会”建设，不可否认，30多年来，中国在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上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治理工业污染，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为缓和城乡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面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生态赤字还在不断增加。

而农村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承受化肥、农药污染，畜禽、水产养殖污染，农业废弃物污染，农村生活垃圾等自身发展带来的污染，还面临着城市污染产业不断向农村扩展和城市生活垃圾不断向农村转移带来的沉重环境压力。看似欣欣向荣的乡村潜伏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

从长远来看，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提高，绿色乡村是现代化社会最美好的人居环境，市民必然会回流乡村，人类必然会回归大自然。广阔的农村，是中国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和不可多得的空间，其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真诚期待：在新农村建设与“两型社会”建设中，有更多的目光聚焦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关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让《寂静的春天》消失在中国农村的田野上……

目 录

■ 专 稿

- 从信访制度看社会稳定机制 赵树凯 1
日新月异看大寨 大寨村委会 7

■ 特别关注：乡村环保

- 生活垃圾正在严重污染乡村生态环境 陈文胜 王文强 11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谁之过? 贾建友 16
从垃圾处理看农民视野下的两型社会建设
——以长沙市郊区民望村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马润生 李超峰 20
农业村的水污染亟待治理 何 勇 26
湖南首个村级污水处理站遭遇“运行费用”之困 文 翊 28
影响和制约基层环保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祁国厅 31
加强对农民环保教育刻不容缓 彭巨水 33

■ 热点解读：农地流转

- 农地流转的现状及对策
——来自重庆市、安徽宿州市部分区县的调查 马怀礼 华小全 35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基本经营制度的利弊 陆福兴 41
如何解决阻碍农业发展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吕邦列 45

一个乡干部的耕地承包工作手记	田雨露	49
■ 乡村故事		
一个贫困村庄的新生	杨 豪	51
岭村印象	李建斌	55
■ 大学生村官		
做村官第一年	王 亮	59
从大学生村官视角看村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张吉星	63
■ 一线纪实		
食品安全 前路漫漫	王志振	66
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赵君 刘涛	70
村庄撤并, 有哪些模式可以选择	付得前	74
广东农产品物流遭遇现代化难题	蒋明华	78
乡镇农村金融员工人身安全亟待保障	张君生	82
■ 星村纵览		
龙泉村: 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进程中培育新型农民 ——宁乡县龙泉村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张黎 向建洲	85
■ 县乡连线		
中国农村教育的两难选择	张晓冰	92
怎样的农民、怎样的农业	刘放生	96
小城镇建设不可忽视	胡晓芹	102
昔阳县新农村建设之路	赵富华	108
乡镇的尴尬如何解	武文杰	115
拿什么留住乡镇干部的心	邓叔明	118
■ 调查报告		
新典型村庄调研报告 ——长沙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持续发展调查	朱有志 刘新荣	121
■ 深度观察		
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	张德元	125
一个新的农民自治组织是怎样建成的	赵俊臣	131
转轨变型时期的农民增收	杨中万	138

催生现代农业的新探索

——湖南攸县“北坪模式”的启示	文会中 144
-----------------------	---------

■ 海外窗口

泰国农民市场的体验和观察	周 立 148
--------------------	---------

■ 一家之言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转向农民工	徐昌生 154
----------------------	---------

■ 想说就说

农业税取消后的农民负担	
——中国乡村发现网第三届QQ论坛综述	范东君 157
农村公益事业发展路在何方	黄迁海 162
我是农民我怕啥?	楚国良 164

■ 小贴士

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优惠政策有哪些? 32/ 转让与转包、出租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34/ 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44/ 什么是转让? 58/ 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有些什么规定? 62/ 对未进行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水面等应如何流转? 65/ 什么是转包? 69/ 什么是互换? 77/ 什么是出租? 81/ 转包与出租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107/ 什么是大学生村官? 147/ 大学生村官和公务员有何区别? 161

《中国乡村建设》征文及乡村图片征稿	168
编后记	169



从信访制度看社会稳定机制

赵树凯

大接访能否化解基层根本冲突

回顾农民信访的历史可以发现，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而不是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的资源利益纷争；其次，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已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第三，体制内抗争（如上访请愿）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是，体制外行动（如暴力抵抗）也明显增加。

瓮安事件后，全国范围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开始。大致看来，县的主要领导人从

原本没有常规的接访安排或一个月接访一次，变成一周一次甚至更多，这种做法的效果是显著的：掌握基层实权的领导人直接面对上访人群，既容易迅速发现问题，也能够直接解决问题；同时，对信访部门工作的强化，包括人员编制和经费增加，甚至酝酿机构升格也有重要作用；还有利于信访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重要的应对措施，对于化解基层冲突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作为应对上访的重大举措，大接访虽然很有效果，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且难以持续。让基层的党政主要领导花大部分时间在接待上访人群和处理上访事件上，使得县委书记和县长变成“信访专员”，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状况。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基层领导对于这种状况很无奈，也有许多抱怨。一位县委书记说，从他个人处理信访的经验来看，认同“百分之八十的上访要求是合理的”，应该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那“百分之二十”怎么办？这些要求或者是不合理的，或者即便合理也不是基层的职责权力所能解决的。

信访困局根源何在

信访困局根源于政府体制，笔者认为，当前信访问题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政府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

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力格局来看，上级集权过度。现在，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上级政府不信任他们。基层一旦出现问题，上级就忙于收权，搞垂直管理。在一些上层人士看来，如果上级不严密管制，基层就会出更多问题，因此出现了这样的逻辑循环：中央政府将若干本应属于省市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省级将一些本应属于市（地）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市（地）对于县，县市对于乡镇，乡镇对于村庄，基本上照此办理。结果，越是基层越没有权力，而且责任越大，政治风险越高。在党委与政府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党委对政府不信任，于是把政府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其实，权力集中在上级手里，事情未必办得好，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上级政府人员的既得利益，更容易造就大量的政府腐败。改革至今，上级集权和党委集权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显著加重了。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

从领导体系的权力结构来看，一个明显特点是个人集权，主要表现为党委书记集权。在一县一乡，党委书记高度集权，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在“书记”手里。最近

基层该如何获得政治信任

为了实现更好的政治稳定，当前的重要工作是政治信任建设，具体来说，即是让群众更加信任和支持政府。按照一般的理解，经济上升，百姓生活不断改善，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应该上升。可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增长，改善了生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百姓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问题。这就是说，政治信任与经济发展并不是直接正相关。企图依靠加快经济发展来增强政府信任，或者保持社会稳定，往往是不成功的。且不说这种经济的高增长能否长期持续，即便能持续，也不一定达到提升政治信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相反，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机制来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不稳定倒是很有可能。

不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多种民意调查都显示出这样的结果。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一般民众认为政府是普遍有效的，值得信任的，因为美国政府带领大家走出了大萧条并且取得了二战胜利；但到了70年代，越战失败、政府腐败等问题不断发生，政府的信任度显著下降；90年代公众普遍认为政府是支离破碎、效率低下、不值得信任的。如果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开来考察，则发现，在整个政府信任下降的同时，中央政府信任下降更为严重，地方政府获得的信任明显高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在民主制度下，民众与地方政府有较多的互动，具有较多的日常渠道来影响决策，因此，地方政府获得的信任明显高于中央政府。但是，在中国，情形恰恰相反，多种调查显示，中央政府获得的信任明显高于地方政府，而且地方政府的信任有越来越低的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捕捉，如我们经常听到农民抱怨：“上边的政策很好，下边的干部太坏”，“上边的领导人好，下边的领导人坏”等。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和政治后果是需要观察研究的。

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是否畅通

毫无疑问，信访部门在化解冲突维持稳定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稳定农村卓有贡献。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信访通常的做法是，把农民的上访材料留下来，化转或协调职能部门解决。一方面，材料在一层一层向下转；另一方面，农民在一级一级向上走，上访行动往往是“终点又回到起点”。这其中，主要不是信访工作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信访部门本身有种种体制局限。如有的农民去县政府信访办反映违法征用耕地，而征地过程本身就是土地局经过县政府批准

的。在这个过程中,信访部门的尴尬,其实也是政府体制的困境。由于对政府的无奈,媒体便承担了上访者过多期望。

越来越多的上访者涌向媒体,把媒体看成了正义的主持者和希望的承载者,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显示出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不得力。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但是不可能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要途径。更何况,现在对于媒体的监督还有种种不合理制约。所以,在改革政府自身体制机制的同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应该进一步开放。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政治控制和媒体监督从来是相辅相成的。

上访并不是“造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而是一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形式,甚至可以说是现行体制内积极的政治参与。上访说明农民还无意于动摇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采取直接的对抗方式,而是以现行的政策法律为依据,在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内寻求帮助,这正说明他们相信政策法律,相信政府,还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这应当是党和政府所愿意看到的。最可怕的是,人们不再相信上访,不再相信政府本身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得不挺身而出直接对抗,如走上街头,上访演变为街头政治,甚至直接攻击政府。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两年正在发生而且有着蔓延之势的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人们不断加入事件,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情况。但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信访等体制渠道的有效性,使绝大多数上访者能在体制内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至于被迫采取制度外的解决方式。

让权力的授予者监督权力的行使

笔者认为,在现有政府体制基础上,信访不能撤销,而且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信访体系的建设应该寻找新的着力点,或者说建立新的政治支撑。1999年,笔者在系统调研之后给中央领导的内部报告中曾提出,信访工作应该引入人大代表的力量,并以此推动人大改革。现在,仍坚持这一看法。目前的信访体系,虽然从外部看是群众监督,但从内部机制看仍是权力机关的自身监督。信访在本质上应该体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权,而有效的监督应该是,由权力的授予者来监督这种权力的使用。因此,可以考虑的思路也许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比较完备强大的信访机构,将信访监督和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及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

将上访事件的处理和人大代表、人大机关经常性的执法检查结合起来。

特别重要的是，在信访体系调整中，有必要建立人民代表和农民上访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在解决农民群众不满意的热点难点问题中的作用。农民有诉求首先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到上访农民中做工作。如果上访者的要求不合理，代表应该做好解释安抚，如果上访者的要求是合理的，则应该积极帮助落实。通过这种信访体系的运作，可以将大量冲突化解在基层，也让人民代表实实在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密切人民代表和群众的关系。

现在的基层人大代表，乡镇、县、区的人大代表，都是有选区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大代表都有范围明确的选民。无论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制设计，还是从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能上，这些基层人大代表都可以成为沟通基层民众和政府的直接渠道。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选区内发生了民众利益表达的冲突，而选区内的基层人大代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熟视无睹，则说明这些所谓人民代表其实是徒有其名，这样的人大代表制度也不能说成功。基层人大代表直接介入上访等基层民众的利益表达过程，不仅对于维护稳定是重要的探索方向，而且，对于人大代表能力建设和履行职责本身，对于人大制度，都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

有人说，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监督不应该是个案监督，而应是整体的政府监督。这是很成问题的看法。实质上，这种主张是对于人大监督政府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离开了具体的政府行为，离开了政府活动中与公民互动的具体事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评价和监督政府。我们不能搞多党制，公民社会组织也不发达。在监督政府的工作上，目前看来，最现实的就是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让人大更好地运转起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日新月异看大寨

大寨村委会

大寨，这个只有 520 口人 1.88 平方公里的小山村曾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大寨，无疑是许多人心中的“圣地”。而今，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寨早已擦去它那层神秘的光环，回归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得实实在在。

小康路上迈大步

改革开放前，农业是大寨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来源依托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 800 亩土地，全村收入不足 20 万元。1992 年以来，大寨人在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抓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机遇，首先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稳定农业的基础上，跨出山门，走向市场，内引外联，兴办企业，全方位开拓经济新领域。1992 年组建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设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大寨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



化发展的转变，大寨人也经历了从种田农民转化为工人、技术员、管理员、营销员的过程，大寨的经济结构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得到整合与重构，不断创新发展机遇，积极开拓发展空间。如今，大寨已形成以煤炭、化工、建材、农产品加工为主的8个支柱产业。

在农业上，大寨村积极响应中央部署，实施退耕还林。大寨共有土地800多亩，保留了400亩基本农田，实行统一机械耕种，统一水利灌溉，统一购买种子、肥料，统一提供科技服务，统一为农户耕种。今年又申报了省级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通过对田、水、路、林、电的统一整治，使田成方、林成网，路渠整齐畅通，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更可喜的是，近年来，大寨人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工农业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开办了集种植、养殖、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农业开发企业。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大寨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是一个集种、养、加、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农业企业。主要产品有大寨面粉、大寨杂粮（黄金饼、荞麦饼、脱脂玉米粉等精制杂粮）、精用系列浓缩饲料等，其下设的大寨农牧种猪场，是2006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参股经营项目，是中美合资鄂美猪种改良公司在华北唯一的种猪扩繁场，年出栏种猪6万头。猪粪便产生的沼气能供2000户人家使用，沼气渣还是田里的好肥料。大寨核桃露厂始建于2001年，厂址位于阳泉市盂县南娄镇，这是大寨联合兴办的成功企业，双方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原料、水源、资金等有利条件，树立了科学发展、互惠共赢的合作理念，创建了大寨优质产品，该产品深受市场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200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8年大寨经济总收入达3亿元，人均收入1万多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4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54倍，上缴国税1791.4万元，大寨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大寨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艰苦奋斗精神与改革开放道路相结合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大寨人学会了“游泳”，发挥自己的品牌优势，进行联合经营和资本运营。2005年8月，大寨被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评为“全国十大名村”。同年12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被

国务院文明办评为“文明建设先进村”。被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评定委员会授予“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大寨”商标被授予山西省著名商标称号。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大寨党总支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大寨人说，没有党的关怀，就没有与时俱进的新大寨。近年来，党和国家多位领导同志到大寨视察指导，帮助大寨发展经济，极大地鼓舞了大寨的干部群众。省、市、县党委政府为大寨排忧解难，支持大寨重新崛起，发挥示范作用。今天，可以自豪地讲，大寨人没有辜负党的关怀和全社会的期待，他们用自己的优异成绩向世人宣布：大寨又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百姓心里乐开花

大寨人不出门就能挣到钱，这是事实。大寨村520口人，其中在村里企业上班的有270多人，其余都做起了旅游生意，大寨人腰包鼓了，日子过得殷实了。

“小康不小康，首先看村庄”，大寨村上世纪60年代以前，家家户户住在窑洞中，70年代以后住上了排房，而今，全村已有近一半人家住进了崭新的二层别墅。现在，全村新建房面积1100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55平方米。大寨集体经济实力强了，不光住房有补贴，资金更多用在了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的衣食住行上。

近十七年来，大寨村基础建设投资总额超过4000多万元，其中包括水、电、路、房、通讯设施以及学校建设，特别是水利工程，在过去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了水渠，兴建了水池，铺设了管道工程，打深井、修水塘、从根本上解决了干旱地区的吃水、用水问题。冬天时，村里会给每户人家供应1吨煤；春节，村里会给每家每户送上白面、大米、食油、猪肉；重阳节到了，村里会给每位老人送上礼品。10年前，大寨的小学、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实现了全部免费入学，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专科生每年补助800元。为报答几十年为改变穷山恶水面貌付出一辈子心血的老人们，大寨实行养老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养老金200元。如今的大寨，已是“小有教，老有靠，考有奖”，“吃水不用吊，看病不用跑，运输不用挑”，自2005年至今，新农村建设投资达1000多万元。走进大寨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活动场所十分齐全，有图书馆，有健身广场，有农家饭店、农家旅店和农家商店，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日的大寨，已是“房子新化，街道硬化，环境美化”，处处透着祥和，处处彰显安逸。